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 深入研究“两个结合” 推动朱子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

□陈来

南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崇安、建阳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而朱子所代表的理学文化,在近一千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武夷山考察,走进武夷精舍,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对朱熹的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精华表达了高度重视,并从文明史的高度谈到中华五千年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华

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特别是,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武夷山是“第二个结合”重要思想的首发之地。

事实上,这正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和党的二十大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发展。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把他在朱熹园的重要讲话宗旨更加明确地作了表述,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而从时代意义上讲,主要是提出和强调“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2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就把坚持“第二个结合”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华文化的各种提法联系为一体了。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

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对“第二个结合”的性质、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说明。以上回顾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党中央提出“第二个结合”具有重要的真理性意义,可以说是党中央思考和表述这一重大问题的直接起点。我们要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讲话的历史意义和思想精髓,把朱子文化的传承发展推向前进。

国际儒联作为凝聚了85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具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作为首个把永久会址设在中国的国际学术文化组织,始终致力于文化传承创新和文明交流互鉴。近年来,国际儒联努力开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文交流新局面,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与

有关方面推进深度合作,成功举办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和合文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分论坛、中华国际文化传播论坛、阳明心学大会等高端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策划出版《典亮世界》丛书,深刻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启示有关论述;出版《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创办出版《国际儒学》(英文版)期刊,实施“国际儒联学者计划”,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与故宫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设立南孔研修基地、阳明研修基地、朱子研修基地,在传播传统文化精华、促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开创了新格局。我们要共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儒联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宣传好、发扬光大!我们愿意继续携手有识之士,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力量!

寿亭论丛作为传承弘扬朱子文化的高峰论坛,将以朱子文化为着手路径,深入研究“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研究朱子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朱子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 创建基于中国道理和中国经验的中国理论

□孙正聿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和“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个人体会最深的是三个论断:一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二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三是“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从这三个论断出发,我想谈两点体会:一是为什么必须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二是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中国经验”的内涵是极为丰厚的。它包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实践和七十多年执政政治国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经验。

总结好“中国经验”,不仅必须直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而且必须回答“用什么”总结和“怎样”总结的问题。面向“中国经验”,我们需要以多维的视野、多重的问题、多种的理论模型、多样的研究方法去把握、观察、分析和阐释,最为根本的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中国道理”,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就是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就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主”“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理论思维与实践价值相统一、理论创造与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与构建体系相统一、理论创造,用深沉厚重的“中国道理”观察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切实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首要的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根本标识和实质内容,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其首要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并且明确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辟概括,不仅指明了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而且深刻地“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为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哪些最为重要的

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就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主”“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理论思维与实践价值相统一、理论创造,用深沉厚重的“中国道理”观察和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切实总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首要的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根本标识和实质内容,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其首要前提,是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并且明确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辟概括,不仅指明了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而且深刻地“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为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哪些最为重要的

“中国理论”,指出了明确方向和实质内容。

“有学理性的”“中国理论”,其深厚基础和独特优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决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决不能丢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所形成的求索“天人之际”的人与自然之辨、探索“人己关系”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理欲关系”的人与自我之辨、深究“知行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之辨,追求“修齐治平”的家国天下之辨,构成了规范和引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是我们“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这为我们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宝贵的辩证思维和实践智慧。我们这次论坛,以“融通朱子文化,夯实文明根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主题,深入研讨朱子文化所凝练的中华文明,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练出总结“中国经验”

##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性 全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

□张志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十分深刻,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重视文化教化功能的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并进而形成系统成熟的文化思想,在党的理论史上也是创举。

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时代发展大势,深刻认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党对文化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体系贯通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标举出鲜明的宗旨,由统一的原则所塑造,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性意义。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意义。

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有了高度的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文化

多元多样和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全面的战略擘画。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对牢牢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性,形成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党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把文化建设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将文化与宣传思想并列,表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意义,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哲学高度,深刻阐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高度重视精神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唯有精神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潮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的突出强调,深刻把握了作为“五位一体”之一的文化建设,实际上发挥着统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诸领域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由文化建设所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了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了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式现代

化奇迹,促进了物质与精神双重共同富裕。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自信上的自我”。坚定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是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工作布局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坚定的文化自信是捍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在于坚定的文化自信使我们从根本上避免了由于丧失自我从而最终丧失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综合力的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一以贯之的强调,深刻把握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深刻认识到了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途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

第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是提出了“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根本标志。“第二个结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形成原理的作用。“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的道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同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五千年文明道路一以贯之,打开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把保持对中华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信心,把坚守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支撑。“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创性贡献,开辟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局面,打开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空间,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华文化生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让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时代代表,代表了中华新文化、人类新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五,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根本途径,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结果,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现代化化的文化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新文化为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图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

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同时,用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的教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苏式社会主义教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克服复古主义的教条,提出了新起点上的新的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就是在“两个结合”中创造出具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类的社会和人类的新文明形态。

第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外交思想、强军思想、生态文明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发挥着统括性的作用,是让这个理论体系能够凝聚为一个整体、具有体系性特征、呈现出总体性意义的关键内容。

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原理性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的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地位和作用相一致的。因此,通过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全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体系性指引,也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思想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朱子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

——以《四书集注》为例

□吴邦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夷山朱熹园时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继续开来。

继往开来是朱子首创的词典,更是朱子毕生的追求。王阳明评价说:“朱熹的精神气魄宏大,早年他立志效法圣贤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著述上苦下功夫。”朱子的著述很多,而《四书集注》则是其继往开来的最好写照。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著作的总称。最早提出“四书”概念的是北宋的程颢、程颐。然而,“二程”只是提出了基本的思路,尚未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受“二程”的启发,朱子对“四书”高度重视,为精益求精地理会《四书》耗费了四十多年的精力。先后著有《论语集解》《论语要义》《中庸集解》《中庸章句》《大学集解》《大学章句》《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四书或问》等。在撰写这些著作的过程中,又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才集成为《四书章句集注》(后简化为《四书集注》)。而后,又复修改、完善,直至临终前还在修订,最后达到满意的程度。朱子的《四书集注》闪耀着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

### ◆开创“四书”经学时代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汉唐及之前的儒家学者对“六经”(即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其中《乐》已失传),很是顶礼膜拜,而且喜欢采用对“六经”的训诂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北宋开始,儒家学者逐渐重视“四书”中经学

的价值。朱子集先贤学说之大成,首创“四书”合集之名,主张“四书”重于“六经”,大力倡导《四书》学,成了经学史上下划时代之事。故而有学者认为,北宋之前为“六经”时代,南宋以后为“四书”时代。

朱子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认为“四书”直接体现了圣人之道,而“六经”不过是佐证圣人之道的间接材料。朱子指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还生动地比喻说:“《论语》《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形容读“四书”能直接吸取圣人之道,而“六经”则与圣人之道相隔两重,甚至三四重,难以吸取。

当然,朱子主张立“四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并非否定“六经”的价值,废弃“六经”训诂之学。而是主张:在经学主次上,“四书”为主,“六经”为从;在经学顺序上,先学“四书”,后学“六经”。朱子强调:“今学者不如此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且就见到道理精细处,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通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由此也可看出朱子在治经上既守原则性,又有创新性。

### ◆承袭圣贤道统

所谓道统,指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脉络和系统,其发端于孔子。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追叙尧以“允执其中”之道授舜,舜也以“允执其中”之道传授禹。孟子则进一步追叙:“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认为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汉代董仲舒更直接明了地指

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唐代的韩愈详细地叙述:“斯吾所谓道也,非同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从孔子、孟子至董仲舒、韩愈,都对圣人之道一脉相承作了阐述,却未有“道统”一说。“道统”一词的发明权属于朱子。

朱子在其所作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提出“道统”之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统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神授天立极,而道统自传有自来矣。”朱子不仅首创“道统”之词,而且阐明“道统”之义:“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后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在此,朱子又首创了“继往开来”之说,把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为“道统”说赋予时代的特征,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 ◆奠定理学基础

朱子理学是庞大的理论体系,其基石就是“四书”学。朱子认为义理蕴涵在“四书”之中,故透过“四书”的注解,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构建的理学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

朱子透过《大学章句》阐发义理。朱子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的三纲领;把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的八条目。指出:“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强调治《大学》的目的就是懂得格物穷理,“圣人不可令人愚穷理,须要格物者,是要人那上见得道理破,便实。”还强调要把“见得道理”,视为治《大学》的第一要务。

朱子透过《论语集注》阐发义理。朱子认为《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了无穷的道理。朱子就《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逐字解释:“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入欲。”指明:克己复礼就是克制人欲而复归天理。

朱子透过《孟子集注》阐发义理。朱子在解读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论时指出:“心者,人之神,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又所以书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蔽而无以尽乎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书,亦不外是矣。”很巧妙地把心性论与天理论结合起来。

朱子透过《中庸章句》阐发义理。朱子认为《中庸》立言的本意是道出于天,又存于己心,只有下足存养省察的工夫,才能真正达到圣神功化的境界。朱子还将《中庸》的义理,阐发为天道的本质属性:“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当然也。……圣人之诚,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朱子抓住一个“诚”字,便打通了伦理与天理融合的通路。

朱子透过《四书集注》对义理的阐发,为构筑理学体系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 ◆开书院教材之先河

书院自唐代兴起,至宋代鼎盛,然而书院的教材建设十分薄弱。南宋以前多以“六经”为主教材,再辅以书院主持者所偏好的读物。朱子编写《四书集注》的初衷,除了承袭道统、弘扬义理的目的外,便是试图改变书院教材上杂乱无主的状况,以“四书”取代“六经”。

朱子晚年寓居将乐,创建了沧州精舍,发出了“吾道付沧州”的宏愿,并将《四书集注》正式列为书院主要教材,开启了书院教材建设之先河。此后,南方诸多书院纷纷仿效,掀起“四书”学的热潮。然而好景不长,庆元二年(1196年),朱子蒙冤,被打成“伪学之魁”,其《四书集注》及《语录》遭禁毁。直到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皇帝为朱子平反,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四书集注》终于又重见天日。此后,《四书集注》不仅成为全国书院的必修教材,而且流传东亚,被朝鲜、日本引用为教科书。朱子不仅精心编撰《四书集注》,而且亲自讲授和指导《四书》学,强调《四书》学习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朱子在安排“四书”次序上独具匠心,其门人黄幹对此印象深刻:“先人教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领而尽《论语》《孟子》之精微;不参之以《论语》《孟子》,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学大,经统大经,而谈天下之事,论天下之事故?”朱子还通过书信答疑解惑,指导门生学习《四书集注》。在《朱子语类》中所载的相关书信多达数十封。

综上所述,朱子的《四书集注》承袭道统,奠基理学,拓展教化,开辟了新儒学的新时代,展示了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在当今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朱子继往开来的精神气魄无疑是值得学习弘扬的。

(作者为武夷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